

“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理論體系

楊允中*

一、珍惜澳門特區第一個十年發展經驗

胡錦濤主席指出：“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的 10 年，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 10 年，是澳門基本法順利實施的 10 年，也是澳門各界人士積極探索符合澳門實際的發展道路、不斷取得進步的 10 年。”¹ 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其發展史上第一個 10 年，無疑是極為重要、極為關鍵的時間段。這 10 年，無論經濟政治還是社會文化，無論內部結構優化還是對外影響力，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這是“一國兩制”科學性和生命力得到全面驗證的 10 年，也是澳門各界居民“愛國愛澳”情懷和聰明才智得到充分展示的 10 年。認真總結屬特區奠基工程的第一個 10 年發展經驗，是確保澳門特區健康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總體觀察，對澳門特區具奠基意義的第一個 10 年可以用 8 個字來概括：“兩大”、“兩新”、“兩高”、“兩有”。即經濟領域：總量大擴張、民生大改善；政治領域：新政治體制、新施政理念；社會領域：高穩定度、高和諧度；文化領域：綜合競爭力有所提升、核心價值觀有所調整。這意味着新型政治社會制度、新型政權、新型民主業已全面啓動，公民基本權益得到名符其實的保障。這是歷史性進步與飛躍。對形勢演進基本面的整體性判斷，不應動搖，也不應懷疑。

澳門特區第一個 10 年快速發展進程，也伴生一些結構不合理、制度有漏洞、理念不到位等現象。當前，在澳門不能說不存在亟待認真關注、亟待積極化解的問題，也可以講所謂深層次問題並未遠離這座小城。某種意義上講，澳門目前缺的不是穩定而是全面公平競爭；缺的不是和諧，而是高公民意識；缺的不是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尊重，而是對其正確理解。這表明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延續文明為要旨的法

治，新型的“一國兩制”法治，還要進一步完善。因此，強調公平競爭，強調深度開放，強調對深層次問題的防範，強調對循序漸進推進民主的理解，強調對“一國兩制”法治與“一國兩制”文明的理解，不能認為是多餘的。

現在，澳門特區第二個 10 年的第一年開局順利。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在 2010 年新年文告裏提出的陽光政府建設與提升科學決策水平兩大發展目標，在其首份施政報告裏更把這兩項確定為“新的時期特區政府的突破口”，實際上正是對特區前 10 年發展經驗的核心認識。要推行科學決策，打造陽光政府，就要“力求施政高效、廉政、透明。優化公務員隊伍，深入反貪倡廉，加強施政，恰當問責。完善諮詢機制，鼓勵公眾參與。透過政策研究室與各領域政策制訂部門，以及與高校和民間學術機構的互動，科學制訂、落實並完善各項決策。在嚴格遵守《澳門基本法》的基礎上，廣泛吸納民意，根據澳門的實際，有序推進民主政制建設。”² 面對全新形勢，人們的關注重點在哪裏？以下幾方面也許具有一定的甚至是特殊的針對性價值：對制度建設與體制、機制完善的持續關注；執政能力與執政理念的同步提升；政權建設與公民社會建設的同步推動；依法掌權用權與官員人格魅力的兼顧。

二、對“一國兩制”的科學認知

“一國兩制”方針正式定型並全面推行已有 30 年歷史，兩個正式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成立至今也分別有 11 年及 13 年歷史。但有關“一國兩制”基本內涵與理論價值的探索、研究，似乎仍顯力度不足、層次不夠。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一國兩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級研究員

制”已作為基本國策而寫入中央文件。

“一國兩制”列入基本國策是名至實歸。它既是政治上充滿智慧的高端決策，也是法制上的成熟型創新成果，既是文化上求同存異、互利共贏思維的集中展示，也是哲學上知行合一認識論的新發展。因此，作為基本國策，特區官員、居民以至全國人民都有責任確保其有效落實。這就要對“一國兩制”基本內涵與理論價值有個較為系統而深入的認知，這就要集中學術力量並投入必需資源作好開拓性研究。

“一國兩制”是特區最大發展優勢，這個優勢同原有優勢合理整合就令特區如虎添翼，就有條件和可能創造出改變歷史的發展成果。澳門特區前10年跨越式發展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一國兩制”是現代發展觀的體現，現代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要求是甚麼，在澳門如何切實落實？這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梳理並作出回應的大題目。其實，在發展觀體系中定位觀、競爭觀、創新觀等價值理念尤為重要。

“一國兩制”是社會核心價值的展示，價值觀與科學認識論何以重要，如何建立特區核心價值體系？政府要回答，社會要回答，生活在特區的每個人都要回答。事實上，就澳門來講，回歸之後“愛國愛澳”已成為社會第一核心價值。要有效落實“一國兩制”，不僅經濟民生這個基礎要抓住不放，而且持之以恆地推動廣大居民以“愛國愛澳”為核心的公民教育同樣是基礎性的課題。

“一國兩制”是理念創新、價值創新與制度創新。就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來講，其法律定位與發展目標完全一致，但兩者之間同樣有同有異，大同小異，及時總結各自發展經驗，形成有各自特點的實踐模式就十分重要，而且還要強調在實踐中提升實踐水平。

從現有理論和特區實踐，人們已不難作出認定，“一國兩制”絕不是權宜之計，“一國兩制”絕不是消極防範，“一國兩制”絕不是可有可無、可上可下、可興可廢，“一國兩制”更不是落後思維、向資本主義讓步的產物。作為大思維，它的生命力、優越性還剛剛得到啓動；作為大決策，它的成效剛剛得到凸顯；作為大理論，它必將在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以至哲學領域受到越來越大的關注。作為這項大思維、大決策、大理論發源地的中國，特別是身臨其境、身體力行驗證這項大思維、大決策、大理論的特別行政區官員、學者、居民，更應當仁不讓地在實踐中總結實踐經驗，認認真真地推動相關理論的系統化與完善化。

三、關於特別行政區制度

在澳門特區，人們不時可聽到“基本法規定50年不變，回歸前甚麼樣現在還是甚麼樣”一類講法。來自內地的遊客也往往把“看看澳門的資本主義到底甚麼樣”當成口頭禪。《澳門基本法》第5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是一項揭示“一國兩制”基本原則的重要規定，也是最能體現特別行政區社會現實與特色的規定。但這絕不表明澳門方方面面都是資本主義性質。《澳門基本法》第11條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包括三部分：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經濟制度主要涵蓋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包括以法律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基本制度。特別行政區保護居民基本權益的制度，包括對中國籍居民權益的雙重保護制度和對非中國籍居民權益的保護制度，這中間具有極不尋常制度創新安排。特別行政區有關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亦即特區基本政治制度是“一國兩制”政治制度。包括雙重代表、雙重負責的行政長官制度，行政與立法既合作、支持又監督、制衡的行政主導制度，單一行使立法權的立法制度，完全獨立的司法制度，體現“澳人治澳”的新型公職人員制度，高層官員宣誓效忠制度，以及財政、稅收獨立，實行自由港、單獨關稅區、開放博彩業制度，多元、開放、寬鬆的社會文化制度等等。這表明以保護私有產權制為核心的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只是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的一部分內容和要求，而不是全部內容和要求，而特別行政區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是完全新型的、有中國特色和澳門特色的、充分體現制度創新的安排。

澳門回歸是一場根本性制度變革，其意義、價值不容低估。回歸之後根據國家憲法授權和基本法規定，特區實行的是新型的“一國兩制”政治制度或特別行政區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59、62條，已對特別行政區和特別行政區制度作出了清晰而明確的憲政規範和指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及通過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加以法制化、規範化的“一國兩制”新型政治制度或特別行政區制度，經過特區11年以上實踐檢驗，不僅完全符合中國國情和特區現實，而且已全面展現出其無可比擬的巨大生命力和優越性。因此，人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現在，特別行政區制度

是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實行是國家憲政創新的體現，也是憲政進步的重要標誌。由於這項嶄新制度的啓動與實踐，我們單一制國家憲法開始帶有不尋常的特異性，使其包容量更大、適應性更強、優越性更突出；也正是由於這項嶄新制度的啓動與實踐，我們單一制國家憲政開始具有一定複合性，使之更具活力、更具凝聚力、更具向心力。從政權屬性觀察，這個新型制度具有授權性、地方性、從屬性、獨創性、受惠性等特徵，從理論屬性觀察，則具有兼容性、務實性、實驗性、示範性、開拓性等特徵。特別行政區最大的“特”就在於它的理論突破和制度創新。推動特別行政區沿着既定軌道順利前行，事關特區自身長期繁榮穩定和居民福祉持續提升，更事關基本國策的有序落實和國家核心利益的正當維護。因而，維護國家主權、維護中央政府權威、維護“一國兩制”權威，正確處理好中央與特區之間關係，這是特區政府與廣大居民面前的一項歷史使命，也是確保特區長治久安、繁榮穩定的關鍵性一環。

儘管澳門可以稱之為法治地區，但法制建設、法治完善依然是一項長遠性、根本性課題，依然任重而道遠；依然需要特區政府抓緊抓實並身體力行，也依然需要全社會投入越來越大的關注。講特別行政區制度或“一國兩制”政治制度業已全面建立起來，這主要是從政權性質作出的判斷，而從澳門特區現實出發，恐怕無論從宏觀還是從微觀切入，無論從行政管理還是從立法權、司法權的有效行使作出認定，都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改進與完善空間，都有一個落實制度創新的客觀需要。

四、關於“一國兩制”優勢

回歸對於特區廣大居民來講是歷史性契機，生活在特區的中國公民都是幸運的一群，他們得到的保障和優惠要遠遠多於內地居民，甚至講特區的外籍居民的權益也得到異乎尋常的充分保障。澳門特區的法律定位很高、很特殊，可以講得天獨厚：“一國兩制”是優勢，更是強勢，要正確理解，積極配合。

“一國兩制”方針作為基本國策，其科學性、合理性毋庸置疑；其必要性、可行性十分清晰；其長期性、穩定性受到認同；其受益性、創新性極為明顯。

“一國兩制”定型於20世紀80年代初，全面實踐啓動於90年代末，但早在60年代初推出的“一綱四目”原則即已構成其雛型，而其理論淵源與思想淵源更十

分漫長與深遠：一是求同存異、互利共贏思維，這是中華文明千百年來世代相襲、發揚光大的必然；二是不戰而勝、以智取勝思維，這是最能體現政治智慧高超、最能體現尊重公民基本權益的人本主義的合理選擇。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大思維、大創新：它既順利解決了歷史遺留難題，展現東方文明價值，同時又及時開創了共存共榮、互利共贏的發展新路。

如今，澳門特別行政區是國家現有兩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之一，作為“一國兩制”的現實載體，澳門特區居民是幸運一代、受惠一代，更是負有開拓創新使命的一代。“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也成功在澳門。“一國兩制”令澳門人生活更美好，也令澳門人享有更大尊嚴，它帶給澳門的是加快繁榮進程和持續提振信心和勇氣，澳門居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理解也逐步進入佳境，但這還只是剛剛起步，還只是第一階段成果。在前行路上風浪難以避免，還要進一步認真面對與積極調整。對可能出現的深層次問題與矛盾的防範，更是對特區領導層與全社會政治智慧的考驗。故此，要力求做到從成功走向更大成功；做到受益與示範並重、實踐與創新並重。除此，不應有其他選擇。

五、關於“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

“‘一國兩制’事業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繁榮的事業，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已經取得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把這一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需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努力。”³ 國際經驗值表明，探索與總結發展規律是為政者、治學者的一大核心使命，也是專家學者和一切有條件人士自主命運的一項科學選擇。

實踐“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創新事業，既然這項偉大事業具有內在合理性、必要性，那麼對其實踐的探索、總結並完善就應成為一項常態活動，就應真正做到與時俱進。因而要在實踐中增長見識、完善認識體系，要在實踐中提升實踐水平。“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關鍵是要把愛國和愛澳有機統一起來。既要維護澳門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又要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安全，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既要維護澳門特別

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充分保障澳門同胞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又要尊重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權力，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澳門事務。”⁴

從中央政府到全國人民，國家對澳門居民的厚愛、關懷有增無減，對其所寄期望、鼓勵既殷切又實際。正如胡錦濤主席所講：“澳門同胞既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主人，也是國家的主人。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不僅從祖國內地快速發展中獲得了源源不竭的發展動力和越來越多的發展機遇，在國際上分享着偉大祖國的尊嚴和榮耀，也為國家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⁵“實踐證明，澳門人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澳門的。”⁶因此，面對新一輪更為有利的發展形勢，選擇走一條創新開拓、自強不息、與時俱進新路，不僅完全必要，也完全可行。

當前，在推動新一輪實踐中要把共性與個性、普遍性與特殊性、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關係進一步梳理好，把相互間的平衡點調整好，從而確保在政策制定以及現實操作中擁有盡可能大的主動權。“探索‘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或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模式，應該說，已提到歷史日程，既有理論的必要性也有現實的可行性。”⁷這項活動意義巨大，影響深遠，它是肯定共同性、肯定大方向、肯定“一國”的前提，它也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尊重澳門人主觀能動性的客觀要求。“它有助於對遵循社會發展規律，遵循民族文化傳統，遵循求同存異、和平共贏的核心價值的思考，也有助於通過理性思考對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及時做出符合規律的判斷，有助於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和在實踐中提升實踐‘一國兩制’的水平。”⁸

特區十年“一國兩制”實踐經驗十分寶貴，在一定意義上，不妨講業已完成奠基工程，業已走上較為常態的運行軌道。講來講去，其實，澳門特區最大成功一是擺正“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維護國家主權與授權管治的關係，二是抓住發展這個硬道理，認真抓好經濟與民生，這樣施政民主化、民本化就有保障。澳門特區最大經驗一是政府與社會的國家觀、民族觀比較清晰，“愛國愛澳”為核心的價值觀調整較為到位；二是全面堅持對擴大開放度、包容度、和諧度亦即現代發展觀的理解、認知。在按照基本法依法施政的社會環境裏，推進法治的行為主體既有特區政府，又有全社會廣大居民。這也是作為“一國兩制”基本國策核心要素之一的“澳人治澳”的基本要求。新型“一國兩制”法治要切實維護廣大居民的基

本權益，廣大居民也要積極推動“一國兩制”法治的有序發展。

六、關於核心價值

價值觀是人生觀、世界觀的認識基礎，知行合一是科學認識論的核心要求。在正常情況下，“知”是先人前輩經驗的總結，是人類文明的積累與延伸，無疑非常重要，而“行”即社會實踐當然同樣甚至更為重要。“先知後行”還是“先行後知”自古以來在理論界爭論不休，其實，兩者都同樣重要，忽視哪一方都不妥；當然，在特定情況下，適度強調某一面也有其必要性。

建立共同價值體系事關特區發展成效、事關“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核心社會價值是人類文明的傳承和延續，因此，要持有理性的認同、理解心態。諸如人權、民主、法治等理念，並非某些人的專利，而是現代文明普世共享的核心價值內涵。以人權為例，它是個含義廣泛的概念，包含生命權、生存權、發展權、成就權，也包含人格權、形象權、參與權、知情權等等。人權靠制度保障也靠社會群體共同推動；既靠環境優化也靠自我維護。2004年3月14日通過的憲法第4次修正案，已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寫入憲法第33條，成為國家的憲政原則。至於民主，它是個綜合性合成概念，人們既要高度關注政治民主、民主制度化課題，也要適度關注民主傳統、民主作風的形成。因此，它既事關大局、事關特區整體利益，又事關個人權益的有效行使和公民綜合素質的穩定提升。

在尊重、維護國際公認的一些價值觀念的同時，更應看到進入特別行政區發展階段的港澳社會，“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應該而且事實上已經成為廣大居民須臾不可離開的核心社會價值。“愛國愛澳”是現階段澳門特區居民第一核心價值，受到較高支持率值得欣慰。事實上，“一國兩制”既是制度創新的成功範例，又是現代文明的合理昇華。在全體居民特別是青少年中深入推進“一國兩制”教育，必然導致新型“一國兩制”文明觀的形成。構建同特別行政區制度相適應的新型社會價值體系，具有特殊意義：一是尊重中央、尊重國家的層級觀念；二是維護憲法、憲政的全局觀念；三是堅持以民為本的文明施政觀念；四是敢於創新的開拓探索觀念；五是“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念；六是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奮進觀

念。“‘一國兩制’是嶄新的文明體系，特區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國兩制’文明的現實載體。進一步培育、構建‘一國兩制’文明觀，確保這個載體的有效性、高效性、長效性，是特區公民社會建設的一項突出內容。”⁹ 按照通常核心價值標準判斷，“一國兩制”文明觀可以解讀為包括愛國觀、是非觀、競爭觀、發展觀、榮辱觀等等基本理念。¹⁰ 一般來講，中老年居民，基本上都經歷過不同時代不同際遇磨鍊，因而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等項較易解決，而生長在物質豐裕時代的年輕朋友，對強調競爭觀、發展觀等項可能會有所偏愛，而對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等項則可能有所忽略。故此，通過各種教育形式令“80後”、“90後”以至“00後”青少年的公民意識持續得到提升，這是一項關係到優良傳統薪火相傳的基礎工程，要細水長流、長抓不怠。

提升政治認同、擴大政治參與是社會轉型的需要，也是澳門居民自我完善、提升綜合素質的重要內涵。在未來的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領域有兩個突出關注熱點：社會多元化、個性化、民主化不可逆轉，但堅持主流價值導向十分必要；和諧、寬鬆、包容是社會主旋律，但必要時基於對本地整體利益的維護也應果斷作出反應，以至軟硬兩種手段兼施。這是“以人為本”施政理念使然，也是政治智慧高超的必然選擇。

七、關於依法施政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早在2004年12月，胡錦濤主席來澳視察時便指出：“要以人為本，不斷提高政府的管治水平。”¹¹ 這表明要在執政能力和執政理念上下足功夫。依法施政，或依法治澳，經過十多年來循序漸進而又積極主動地推動，可以講，已有初步形成新的文明傳統。依法治澳，就是要嚴格按照《澳門基本法》辦事，堅決維護《澳門基本法》的權威。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各社會團體堅持不懈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自覺以《澳門基本法》規範行政、立法、司法行為和處理政制發展等重大問題。這是澳門特別行政區10年來所取得的一項重要成就。要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健全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項法律法規，加強制度建設，特別是要按照以人為本、勤政、廉潔、高效的要求，完善政府行政規章制度，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管治水平不斷提高。”¹² 要確保法治與整體利益一致性，走向善治與尊重民情民意、尊重民權民利的一致性。歷史經驗證

明：現代社會的法治，實質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延續文明的進程。這包括政府要依法制定並執行政策、依法保護公民基本權益，公民具有較高法治意識，高守法率低犯罪率是社會常態，廉潔奉公、遵法守法是社會基本思維定勢。

“依法”的前提是知法懂法的主動到位，是用法執法的公正無私。這對執法行為主體和維權行為主體都值得高度關注。在建設文明、法治過程中要力求兼顧合法性與合理性，民本性與文明性。政府及公職人員要做到不缺位不越位。要使執政能力與執政理念進一步同步提升，就要在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不斷培育與提升政府官員以及廣大居民的法治意識。所謂執政能力，可以理解為實行有效管治的基本行為能力和表現，包括判斷能力、規劃能力、決策能力、溝通能力、創新能力、應變能力等方面。所謂執政理念則可認定為對依法施政的理解、認知和付諸行動的自覺性。與此同時，則宜做好公平正義原則的切實維護，以及對權、利、名驅動的防範。這是一個常講常新、永不過時的關注課題，在澳門也不例外。

推行積極依法施政的核心要求可以歸納為8點：
①行政行為合法化，包括積極作為與積極不作為兩個方向的行政行為；②行政決策科學化，決策過程要堅持優選原則、利大弊小原則，受益面最大化原則；③行政程序正當化；④行政服務高效化；⑤行政誠信守恆化；⑥行政監督自律化；⑦行政責權一致化；⑧行政理念到位化。¹³

依法施政是一個綜合性、全局性課題，核心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提升文明指標。依法施政必須與民主施政、科學施政、文明施政並舉。首先是對政府和公職人員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是對全社會的共同要求，無論從法的效力體系觀察還是從社會和諧着眼，無論從權的分割還是從利的分享，都構成一幅完整的相對畫面，都有待於政府上下、社會上下方向一致的身體力行和切實推動。

八、構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 考驗中國學者智慧

“一國兩制”憲法學、“一國兩制”政治學，是全新的學科領域。“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重要內涵之一，是大思維、大創新。它既是新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核心靈魂，也是這種新型政治制度得以成功的根本保障；它不僅是特區長治久安、繁榮

穩定的有效保障，也同國家深入改革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具有直接關聯；它不僅對全面總結中國發展模式提供生動範例，而且對推動國際事務的協調發展必然產生積極影響。“一國兩制”作為憲政發展成果，是憲法學研究對象，也是政治學研究對象。“一國兩制”是中國創造，是中華文明成果。構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目標、要求，應是十分清晰而明確的，基本理念不應缺失，基本共識也不難形成。

當前，“一國兩制”理論研究方興未艾，但仍有待進一步加溫。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國情、中國創新；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為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服務；研究“一國兩制”，就是建設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價值體系、推動民族偉大復興的早日實現；研究“一國兩制”，必然有助於在新形勢下改革開放思維的完善化、成熟化。因此，身為思

考型社會成員一族，要告別依賴思維，要主動承擔，要敢講真話，要調動群體智慧；不要“等靠要”，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怕”字當頭，不要口是心非。

總之，澳門特別行政區規模不大，但自成體系；澳門社會開放，素有傳統。作為新制度示範平台，澳門優勢、特色突出，澳門經驗、啓示頗多。在澳門實踐與驗證“一國兩制”具有不可取代的指標性意義。讓國家形象、國家尊嚴、國家核心利益得到切實維護，讓以人爲本的依法施政有更佳的認受性，讓政府的施政公信力和居民的實際福祉得到同步提升，讓特區建設者分享特區發展成果的機會和他們自身公民素質穩步提高成爲可能，讓生活在特區的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中國公民和非中國公民的基本權益得到有效保障，讓新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先進性、適用性以及示範性、導向性在境內外得到越來越高的認同與支持，這是實實在在的大方向、大原則，也是有目共睹、有待進一步推動的大思維大目標。

註釋：

- ¹ 胡錦濤：《在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週年暨澳門特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載於《澳門日報》，2009年12月21日，第A1版。
- ² 崔世安：《2010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10年3月16日，第22頁。
- ³ 同註1。
- ⁴ 同上註。
- ⁵ 同上註。
- ⁶ 胡錦濤：《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五週年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載於《澳門日報》，2004年12月21日，第A1版。
- ⁷ 楊允中：《“一國兩制”——中國憲政發展的重大創新》，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第1期，2009年，第5頁。
- ⁸ 楊允中：《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09年，第42頁。
- ⁹ 楊允中：《特別行政區與特別行政區制度》，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第4期，2010年，第22頁。
- ¹⁰ 楊允中：《憲政進步與“一國兩制”文明》，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第2期，2009年，第5頁。
- ¹¹ 同註6。
- ¹² 同註1。
- ¹³ 同註7，第173頁。